

殷焕先 语言学论文集

YINHUANXIAN
YUYANXUELUNWENJI

殷焕先著

文
别
法



商务印书馆

殷焕先语言学论文集

殷焕先 著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殷焕先语言学论文集/殷焕先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ISBN 978 - 7 - 100 - 10547 - 7

I. ①殷… II. ①殷…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

IV. QH1 - 53

* 藏书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712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殷焕先语言学论文集

殷 焕 先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0547 - 7

2015年5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8 1/4 插页 1

定价：49.00元



殷焕先先生

戲呈李定學長丈兄

大名冠列秦未列鼎
七亦勢之不可至

定做肚皮高家系

子詳金網丈先
將連家至耳而三

拿金腰內起千戈

謂和甲文
拿之於一

堂是亦大光籃球場上稱笑保

弟肺病後能耳嘗球場風
味則丈先一過耳適之切也

經之

小範中止信何

自沙坪高第得附驛則亦得
之三傳歟

子範大光自第一席曾患玉屏銘友愛

大光
自沙

併返里鄉惠賜玉簫

龍年四月初十

時許車
輕玉屏草脚踏實地退食食品多種殊為不承

亦勞方集輝助蒐羅大斧興

諸君自

是始浮生蜀道能無感傷老儒三耐餘磨

爲信哉大聲趣新而
永不老願哉

大足良奇多嘗藉存如試工不支以奉信高丈

士是為此詩矣誠勤郵非我之貢是復以報矣

弟孟兆草

龍年四月初十夜

殷焕先先生手迹

目 录

| | |
|-----------------------|-----|
| 前言 | 1 |
| 关于复辅声的一些看法 | 18 |
| 上古去声质疑 | 30 |
| 陆法言《切韵·序》释要 | 46 |
| 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释要 | 64 |
| 反切释例 | 74 |
| 反切续释 | 94 |
| 新文字字母的字类跟字值 | 111 |
| 请注意一字两音的分歧现象 | 122 |
| 破读的语言性质及其审音 | 126 |
| 声调和声调教学 | 155 |
| 动观文字学 | 171 |
| 文字学的破与立 | 185 |
| 汉字的语言性质 | 203 |
| 汉字字形的性质 | 215 |
| 对现行汉字性质的再认识 | 225 |
| 汉字是怎样才能适合各地方言的 | 231 |
| 谈汉字的“见形知义” | 245 |
| 谈新形声字 | 253 |

殷焕先语言学论文集

| | |
|---------------------------|-----|
| 形声字的形体结构和形声原则 | 269 |
| 明确订定手头草体的规范和确立楷草二体制 | 274 |
| 谈汉字部件 | 289 |
| 现代汉语文字的教学 | 297 |
| | |
| 联绵字简论 | 311 |
| 逍遥释义 | 371 |
| 联绵字和古音 | 396 |
| | |
| 推广普通话运动中的方言调查工作 | 408 |
| 谈方言调查 | 423 |
| 方言与音韵 | 431 |
| 应当加强方言音韵史的研究 | 447 |
| 六合南乡的“维”与“徐” | 456 |
| 寿光北部的“知、庄、章” | 462 |
| 关于方言中的破读现象 | 470 |
| | |
| 语法体系与语法教学 | 480 |
| 句子形式做谓语 | 491 |
| 谈“连动式” | 499 |
| 复杂的谓语 | 505 |
| 用词恰当可以帮助表明语法关系 | 516 |
| 怎样选用单音词跟双音词 | 520 |
| | |
| 谈词语书面形式的规范 | 524 |
| 什么是典范的现代白话文 | 533 |

目 录

| | |
|----------------------|-----|
| 海峡两岸汉语规范化的思考 | 540 |
| 记学 | 549 |
| 视野和信念 | 556 |
| 师道不孤 学统长存——代后记 | 560 |

前　　言

一

殷焕先先生，字孟非，别号居养室主人、蜀友室客，笔名齐中、徐兹。先生 1913 年 11 月 13 日生于江苏省六合县，1994 年 11 月 19 日因病医治无效，在济南逝世，享年 81 岁。

先生幼年失怙，家道中落，在叔父德仁公的严厉督下，刻苦诵读古代经典，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基础。1925 年，先生从私塾转入南京六合县立实验小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929 年，先生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著名的南京中学，与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吕荧、周法高等先生同学。先生后来自述幼时学习和生活的艰辛时说：“我不幸生于‘彷徨’、‘呐喊’的时代。五岁丧父，受教于叔父德仁公，学诗古文辞。叔父与伯父德廉公皆为举子业，家贫，夜为人佣作而不辍诵读声，苍苍凉凉然。世谓为举业而终身不得一中者，无论其为贫为富，其苦读凄凉之音寒人心肺，信然，信然！”（《殷焕先生自述》）

1936 年，先生考入前中央大学中文系。抗战军兴，中央大学由南京迁武汉，继迁重庆，先生在颠沛流离中结束了他的大学生活。他在大学学习期间，受到赵少咸、马宗霍两师刻意栽培，并深受王瀣、汪辟疆、胡小石、缪凤林、姚薇元、方东美诸先生影响。先生曾经撰文回忆中央大学的学习生活：“我是同时考入前中央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来到中央大学后，我觉得空气很沉闷，

曾戏称之为‘四库’派。于是我打算到北京去就学,以效师长学友救亡图存之志。但师友善诱切磋之诚,深深感动了我,同处于风雨如磐之日,‘起来’之誓,万方所同,我又何必去北求,也就安于南雍了。”(《殷焕先自述》)先生又说:“照‘国学’的传统,是文、史、哲不分家的。老师都是渊深广博的。我还没有悟到‘学有专攻’,就逍遥于文、史、哲之苑,随遇而‘杂’了。南雍诗歌结社之风是很盛的。书生哀乐系诸国步,当时多是悲愤之词。那时,也追随师友之后学些新诗,互相传阅。前年周法高兄来信竟仍能记熟我当时 的几首,足令我感动。现在回想,结社,也实在是南雍文科培养学生的一种方法。看来,这个方法还是有其良好的作用的。”(《殷焕先自述》)经过大学四年的学术教养,先生打下了深厚的传统国学的基础。

1940 年,先生大学毕业后,到云南曲靖中学短时做了语文老师,并与谢显琳校长结下了深厚友谊。同时,先生认真备考抗战期间由北平迁往昆明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西南联合大学),并得偿所愿。当时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副所长分别是大名鼎鼎的傅斯年和郑天挺先生。考入研究所后,先生在罗常培先生门下攻读语言学硕士学位。他的副导师是唐兰、袁家骅先生,校外导师是王力先生,所内外其他导师还有陈寅恪、赵元任、李方桂、丁声树等先生。后来成了著名学者的阴法鲁、任继愈、马学良、周法高、李孝定、王达津、王玉哲等等,都是先生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同学。先生晚年回忆这段学习生活时写道:“俗云‘名师出高徒’,我虽不敏,却有幸师从多位著名语言学家。在西南联大时,我的导师是罗常培,副导师是唐立庵、袁家骅,校外导师是王力(了一)。考研究生前我就住在研究所了,考完试,张清常兄为我传递‘内部消息’说,了一先生夸我的文章不错,字也写得漂亮。我不禁暗自庆幸有知遇之感,从此也就决定了我与语言学的不解之缘。”(《殷焕先自

述》)罗常培先生曾经评价先生说:“及门诸子中,孟非最为循谨,治学亦兼综南北雍之长。”(《殷焕先诗词墨迹》)诚可谓知徒莫如师也。

1942年,先生从研究所毕业并获硕士学位后,留在昆明的北大中文系从事教学工作,1943年兼任云南大学讲师。罗常培先生离国去美国访问后,因校务发生变故,1945年,先生离开北大到四川大学任教。抗战结束后,汤用彤先生力劝先生到北京回北大复员,因种种原因,先生没有回北大。1946年,抗战时期停办的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先生通过自己的儿子赵西陆先生(后为吉林大学教授,先生好友)商请先生到山东大学任教,先生欣然就聘副教授。这一年,先生33岁。从此,先生与山东大学结缘近50年,直至弃世。1950年,罗常培先生就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首任所长后,曾想礼聘先生到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先生虽然很想回到老师身边工作,终因不想辜负山东大学,只接受兼任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1955)。

1949年国家鼎革,新中国成立,遭遇过背井离乡、山河破碎的先生,心情无比高兴。新社会给先生带来了新的生活,先生对教学、学术研究和社会工作都充满了无比的热情。

1957年“反右”之前,在华岗校长的支持下,先生积极参与创办《文史哲》,担任了该刊的常务编委、学术秘书兼发行人;先生潜心学术,写出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同时,先生担任语言教研室主任,讲授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字学、音韵学等课程,并率先开设“方言学”课,领当时国内高校风气之先;除此之外,先生还担任了中文系副主任,承担了繁重的行政任务;先生参加了九三学社,是山东地区最早的五人小组成员,并担任了九三学社中央的学习委员等;先生还担任了山东省方言普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主持山东省方言普查工作;先生活跃在当时语文研究和建设的各个方面,

对文字改革、汉语语法研究和方言调查都做了不少研究,发表了一批论文,成为当时富有影响的中年语言学家。因为先生的学术成就,他被聘为《中国语文》编委、《学术月刊》特邀编委、《语言研究》(中国科学院语言所)编委等。

在这短暂的六七年里,先生的学术达到了一个高峰,先生与其他教授一起奠定了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的学术风格。

天有不测风云。1957年“反右”运动风暴来临,不幸降落到了先生头上。因为几句无意而有益的言辞,先生与陆侃如、束星北等教授一起被打成极右分子,先生的教授资格被剥夺,工资骤降,政治上受到了空前的压制,经济上极度贫穷。在这种极为艰难的环境中,先生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顽强地坚持着活了下来,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进行自己的语言学研究。60年代前期,在形势略有好转后,他就发表了几篇重要的学术论文。然而,接踵而至的十年浩劫,又一次将先生推入魔域,身心备受摧残。从“反右”到“文革”,先生与家人阅尽世态炎凉,备尝人间冷暖,靠着先生的老母亲拉板车和先生向亲友告贷,一家八口才没有饿死。

历史跟先生开的这个天大的“玩笑”,差点葬送了先生的生命和学术。“文革”结束后,先生对这20多年的不公平遭遇甚少谈及,也很少抱怨,对折磨过他的人,也难得听到先生的恶评。先生写了一首《满江红——怀吕荧学兄》,并给吕荧先生的女儿写了一信,解释这首词的内蕴。先生说:“谈到令尊大人逝世情况,大大出乎所能想象,令我悲痛。9日收到令尊文集,遗照宛然同学时,伤痛难言。读文集到夜深,更感令尊书生气十足,祸患之来袭,是难以避免的了。但是,这一点,更使我对令尊敬佩,我现在也不替令尊后悔。”(《致吕荧女儿》)这里虽然说的是吕先生,其实先生也是说自己。今把这首词抄在下面:

满江红

——怀吕荧学兄

紫万红千，真明媚，又逢春色。

空叩问，斯人何在，九天岑寂。

八府塘前同笑语，门帘桥畔怀踪迹。

记萤窗忧愤论危亡，心丹赤。

书生梦，原清白。朋友道，由忠直。

怅深山幽径，大都华宅。

文笔自能传世代，性情尤足光篇策。

正枝头悠越到莺声，思畴昔。

1978年后，“文革”遭到否定，国家开始拨乱反正，陆续恢复了先生的政治名誉，恢复了先生的教授资格。先生迎来了生命中的又一个春天。暮年遇朝霞，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先生像青年人一样，热切地投入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他重新担任了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主任，陆续招收了几批研究生，坚持为本科生上课，为人才培养竭尽心力。许多青年在先生的培养下，成了语言学工作者。先生出版了多年心血写成的几部著作，并发表了一批重要论文。他积极组织、推动、筹备各类全国性和山东省的语言学组织，担任了中国语言学会首届理事、全国高校文字改革研究会顾问、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理事（后任学术委员、顾问）、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顾问、华东地区修辞学会顾问、山东省语言学会理事长、山东省方言研究会理事长、山东省古文字研究会理事长。他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建设，主编了《山东省志·方言志》（1995）。他坚持外出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到有关院校和学术单位做学术报告，推动学术提升。虽然，1982年夏，先生作了胃大部切除手术，身体因此逐渐衰弱，多年辗转于病房与疗养院之间，但他仍然以高昂的热情和不懈怠的精力投入学术研究，坚持参加学术活动，培养研究人才，扶持后学。直到病逝前，他还在考虑各种研究和出版规划，在病床上

用颤抖的手为年轻人写着各种推荐信。

先生一生追求进步,追求光明,满怀忧国忧民和强烈的强民富国的爱国情怀。

1994年11月19日凌晨,万恶的癌症夺走了先生的生命。先生走得很安详,没有痛苦的表情。先生的后事安排很周详,先生的骨灰安放在济南英雄山公墓的灵堂。

先生走了,但先生的学术是永恒的!先生的精神也是永恒的!

二

先生以学识渊博著称,他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涉猎的学术领域很广。

(一) 文字学

文字学是先生的研究重心之一。先生的文字学思想深受唐立庵先生影响。

在50年代、根据自己对汉语汉字的理性认识,根据广大人民群众提高文化水平的需要,他满怀热情地投入了文字改革运动,并以自己的扎实的学术研究成果为汉字改革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汉字简化中的“系统”和“类推”》一文较早地提出了系统类推的原则和方法,对后来简化字的定形起到了促进作用。《明确订定手头草体的规范和确立楷草二体制》则从手头书写的角度提出了手写汉字规范问题。《关于汉字形体结构的简化》一文就汉字形体的整体简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形声字的形体结构和形声原则》、《汉字的教学与汉字的简化》、《汉字改革和汉语规范化》等文从不同角度对汉字的改革和规范化提出了富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意见。

先生对《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也发表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他的《谈新形声字》对新形声字的方案进行了驳难；《新文字字母的字类跟音值》、《北拉方案里的o、uo、e》、《新旧文字与声调》、《联系汉字来记注音字母》等，结合教学对拼音方案进行了探讨。

在长期对汉字的发展和使用问题思考的基础上，先生后期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汉字和汉字学根本性质以及方法论的研究上。他的《动观文字学》和《文字学的破与立》等论文，明确提出了“动观文字学”的观点，指出汉字的研究应该从文字的动态发展入手，以文字发展的规律为对象，而不能机械地静态地看待已有几千年历史和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的汉字。对于《说文解字》一类的著作，“应取法于许（慎），而必须取鉴于许”。

《汉字字形的性质》和《汉字的语言性质》专门探讨汉字性质。前一篇从现行汉字的形体结构、“四定”工作等方面提出了对汉字性质的看法；后一篇从语言的角度讨论现行汉字诸方面问题，提出了现行汉字为“专字专用正字音标”的看法。《对现行汉字性质的再认识》一文阐述了文字的工具性，再次重申了汉字为“专字专用正字音标”的观点。

《关于六书》一文，对传统的“六书”说进行了总结和爬梳，指出了传统文字学对六书理解的形而上学的缺陷。

《汉字三论》一书，讨论了汉字“六书”的性质，讨论了现行汉字的笔画形体、汉字的简化与教学等方面的问题，阐述了一系列的新见解。《谈汉字的部件》是先生从教学、文字信息处理角度对现行汉字形体进行切分研究的成果，充分体现了先生动观文字学的观点，在早期的汉字信息处理界产生了启发性的影响。

先生还写有《古文字学讲义》一书，是他四五十年代在山东大学开设古文字学的讲义，书中对古文字的发展脉络、历史演化规律、考订等都有独到的见解，可惜至今未能正式出版。

(二) 音韵学

先生以音韵学名家，早年追随罗常培先生研习音韵，深得本门学问之奥庭。先生研究音韵，很注意独辟蹊径，重视类的分别和值的审辨，强调语音的系统性。

60年代，先生写的《破读的语音性质及其审音》一文，总结了前人关于破读的种种说法，认为破读反映的是语音自然，当自上古始，现代汉语应注意对破读字的语音审定。

80年代初，先生又进一步从破读这一独特角度，写出了《上古去声质疑》。他认为，从破读现象来看，上古汉语里“离去无破”，这说明去声作为一个“虚类”早已存在，“其时代可以推到殷商时代”，而它的最后形成是许多语音要素变化的结果。先生很注意同语系少数民族语言材料的作用，更注意汉语材料的抉微发隐。

90年代，先生发表了《关于复辅声的一些看法》一文，积极而慎重地引用了不同的材料，提出了对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的看法，特别强调要“言可复也”，结论要回到语言材料中验证。

先生对《切韵》音系研究也尽了许多心血。他与学生合写的《陆法言〈切韵·序〉释要》、《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释要》、《重组的历史研究》等文，从不同角度论证《切韵》的语音性质、重组的结构、拟音及其历史来源。先生认为《切韵》是一个内部一致的语音系统（非综合的），《切韵·序》“萧颜多所决定”、《颜氏家训·音辞篇》所说的一些古今音事例，实在是“古今通塞”正确的注脚。“古今通塞”的“古”绝对跟先秦的“古”丝毫无涉。

先生生前与姜亮夫先生主持国家古籍整理项目《经籍纂音》，任执行主编，准备全面整理中国历史上的音韵资料，为音韵学研究提供全面、方便而权威的材料。虽然这项工作因种种原因未能完成，但它的意义、对后来的影响却是相当大的。

先生很重视音韵学的普及工作,变“绝”为“通”是他的愿望。他长期在大学里讲授音韵学课程。60年代,他发表了《反切释例》和《反切续释》,第一次系统全面地分析总结了古代反切与今音的对应规律。70年代后期增订出版的《反切释要》一书,深入浅出地介绍反切原理,总结了古反切与今音的对应规律,指出如何根据反切拼读出今音,这对于读者掌握反切并进而读习古书很有帮助。该书初版印数即达15万册,一时洛阳纸贵,足见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受欢迎程度。

经过多年教学和思考,在先生的有关讲义基础上,先生与学生合作出版了《实用音韵学》一书。该书系统、全面地讲述了音韵学的有关基础知识及其在有关学科里的应用,为广大文史工作者提供了一部极具实用价值的参考书。

先生还以音韵学家的眼光和对现代汉语语音的深入观察,写出了一系列探讨现代汉语声调与语调的论著。《字调和语调》作为“汉语知识讲话丛书”的一种,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关于字调》、《关于变调》、《语调概说》、《声调和声调教学》等论文,在当时的语文界也都有相当的影响力。

先生一向重视方言与音韵之间的比较研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探讨历史音韵与现代方言之间的联系,并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见。《方言与音韵》、《方言音韵学构架》(合写)、《应当注意方言音韵史的研究》(合写)、《方言音韵释例》等多篇论文,既提出了理论的见解,又提供了具体的研究范例,对方言学和音韵学的结合研究极具启发意义。

(三)训诂学

先生精熟古代经典,一直关注古代文献的注释和训释,尤其对《诗》、《骚》等文献里的联绵字素有研究。先生在北大文科研究所